

「異中求同」還是「同中存異」： 語藝觀點下的「認同化」概念探索

曹開明*

《摘要》

本文透過語藝觀點審視所謂認同問題，希藉由結合 Kenneth Burke 提及的「認同化」概念與源自 M.M. Bakhtin 對話主義理論的「美學時刻」定義，強調人們在言說互動時，確有獲致「實質共享」的可能性，並得以穿透表象問題，直指符號互動實能打破人際隔閡與文化承擔，重塑屬於符號互動者在當下能夠欣然接受的認同，同時也為下一次的溝通奠定良性基礎。

關鍵字：美學時刻、區分、認同化、實質共享、對話

*作者曹開明為世新大學傳播研究所博士班學生。E-mail：tommy.intw@msa.hinet.net
投稿日期：2007年10月29日；通過日期：2008年7月。

壹、前言

在台灣社會中，「認同」一詞或已成爲時髦又熱門的名詞，舉凡國家認同、族群認同、文化認同亦或是認同政治，甚至已由學術領域中具有特定定義的指涉，逐漸滲透成爲媒體報章的新聞使用字眼，或是在市民社會中的口語用詞。於是，「認同」一詞也成爲自我尋求（或是抗拒）認同時的言說表達方法。例如網友 vegetarian 在其位於「無名小站」的網誌¹中如此寫道：

認同自己的認同
認同別人的認同
認同什麼呢
想要被認同
想要認同
對啊
仔細想想是這樣沒錯
尋找認同也失去認同
到最後自己會不會也無法認同了？
再怎麼想都是以自己爲出發點
講出來的話沒有太大意義或幫助
只是說些自己的有的沒的
或許只是想得到認同

在 vegetarian 這篇網誌中，其實也點出一般人對於認同的想像，一方面想得到認同，另一方面也自省到「都是以自己爲出發點」，所以「講出來的話沒有太大意義或幫助」；亦言之，網友 vegetarian 或許存在著認同焦慮，同時也質疑要如何

¹ 網友 vegetarian 的部落格網址爲：http://www.wretch.cc/blog/vegetarian&article_id=3309335

獲致那似乎不著邊際的「認同」。但事實上，當這段話語被書寫(或說出)時，毋寧就是他個人透過言說行動希望取得他人認同，認同他看待「認同」問題的想法。

所以，當我們在理解認同的概念時，要注意到「認同的重點不在於指出人們是如何被一種特定方式描述出來，而是在探究人們為何認為自己或他人與這種特別描述方式是有關聯的」(Widdicombe, 1998)。因在人際互動過程中，人們會採取特定的言說方式來建構自己或他人的認同，並使自己或他人認為與此種言說具備關聯性。

易言之，語言即是一種行動，因為我們總是在言說中展現出特定動機籲求，藉以激勵他人與我們共享，這正是語藝學者 K. Burke 所言的「語藝的動機」(The Motives of Rhetoric)。所以，當我們討論語言即是行動時，重點已非聚焦於如何說服他人的表象作法，而是在思索如何達成「認同化」(identification)的前提((Burke, 1969)，藉以釐清人們使用語言對人類世界加以「定義」，並用以促成合作的情形。

依據 Burke 的學說，語藝的符號行動功能就是在於產出「認同化」，也就是形塑出「我群感」的想像概念；而且「認同化」更具有辯證的意涵，因為「認同化」是與「差異」(division)同時存在，語藝的作用就是要克服「差異」，希能「異中求同」，藉以協調社會行動。也正因語藝的功能是在人我關係、群己之間及公私領域間的橋樑，而 Burke 藉由語藝的觀點下所討論的認同化的概念，強調的是認同並非是靜態、固定式的社會標籤意涵，而是人們進行的一種動態活絡的溝通作為。然而，Burke 強調的還是在於追尋認同化中的「異中求同」概念，仍未能明確指出認同化原即具備「同中存異」的特質，故為進一步擴展 Burke 所提出的「認同化」概念，則更應進一步釐清言說中實存有「同中存異」的情境氛圍，因此需要強化理論探索，並發現採取「對話主義」概念來看待語言的 M. Bakhtin，²與 Burke 同樣

²依據劉康在其《對話的喧聲—巴赫汀文化理論述評》一書中指出，Bakhtin 以言語作為他的語言學核心，是因為言說是人類語言、文化行為的基本單位，是人類交流、溝通、社會交往和價值交換的基本要素。Bakhtin 的對話主義言談理論，主要強調四部分：一是作為人類交流的具體語言實踐，言談是一種邊際現象，故 Bakhtin 從個別的言談出發，以言談

曾經指陳出「語言不僅在反映真實，而是實際參與建構世界」(Bakhtin, 1973；轉引自 Herrick, 2006)。其所強調的「美學性時刻」(aesthetic moment)概念(Bakhtin, 1990)，更指陳出人際溝通時得以合諧互動的原則，這與 Burke 所提的認同化概念，確有不謀而合之處，並有助於我們正確看待「差異」問題，讓認同化的過程更為順遂。

也就是說，本文實欲解決長期以來在言說符號中討論認同時，一直為人們所忽視的問題，當我們在使用言說進行認同論述時，不只在追尋「異中求同」的可能性，更應重視「同中存異」的實然存在。否則，所造成的問題就是，我們只是不斷地進行歸類命名的動作，甚至讓認同成為言說中藉以黨同伐異的工具，永遠無法看清存在於社會中認同爭議的實質真相，進而迷失在認同言說論述的五里霧中。故本研究嘗試結合 Burke 與 Bakhtin 的理論概念，尤其是兩人均標榜出符號語言具有無限可能的作用，並強調在彼此尊重個體能動性的前提下，人們可透過符號互動方式達成認同化的契機，有助於釐清符號語言與認同的因果關係，以利理解日常生活中人際溝通時的認同問題，或能有助於後續的相關研究。

此外，本文希藉由語藝觀點論述符號語言才是形塑認同的關鍵，而且所獲致的絕非是種僵硬不變的認同概念，正如同 Burke 即強調「人是符號使用的動物」(symbol using animal)(Burke, 1989)，所以認同勢必要依賴語言打造和建構，在人我之間促成「認同化」(identification)的可能性，進而指陳出當代語藝功能實已轉向，「認同化」才是語藝功能的核心。特別是台灣社會民眾無疑是必需時常面對著所謂的個人認同、國家認同及文化認同所交織交錯形成的溝通情境，倘若將認同單

的獨特性、不可取代性為起點，論證人與人之間、言談與言談之間互相對話、互相交流、互相補充的必要性。二是言談是意識形態符號學的基本對象，強調沒有符號，就沒有意識形態，以及一切思想意識活動，首先都必須是「符號對符號的回應」。三是言談是社會學詩學的基本對象，認為語言乃是一個社會評價的大系統，在這個大系統中，個別的言談之間碰撞、交流、對話，進行意義的價值交換，迸發出意義的火花。四是語錄的政治學是言談理論的例證，強調人們的語言交流中，引語無處不在，也就是我們的每句話，都是對其他人的話語的回應、重複與引用。

純地視為只是固定的身分指稱，必然會感到無奈和挫折，但以語藝的觀點來看待認同論述，強調的就是「異中求同」與「同中存異」雙重存在的特質，直指符號互動實能打破人際隔閡與文化承擔，重塑屬於符號互動者在當下能夠欣然接受的認同，同時也為下一次的溝通奠定良性基礎。

貳、認同探索與符號語言使用

一、符號語言中的認同追尋

由於在傳統社會理論中，大致是將「認同」視為「同時在人與物之間建立起『相似性』(similarity)與『相異性』(difference)這兩種可能的比較關係。」(郭良文, 1997)，「認同」因而成為社會分類標籤。例如「社會認同理論」(social identity theory)與「自我歸類化理論」(self categorization theory)所強調，當我們知道個人歸屬於群體，並因而發展出群體意識後，就有可能引發自我優越或歧視「非我族類」的問題 (Widdicombe, 1998)。換言之，人們經由認知互相對立關係來區分我群及他者，因此創造差異是這套認知分類系統中重要的元素。這些理論談到「認同」概念時，傾向認為「認同」是一種身分主張，亦即人們建構「認同」後，一切即固定不變，無法脫離也不得抗拒；甚至部分社會心理學研究還將「認同」作為「人口統計學上的事實特徵，並發展出一套『社會認同尺度』(social identification scale)用以預測社會行為」(同上)。

上述學者對於認同概念的運用，確有僵化死板之嫌，不足以說明在社會人們生活中實際認同的作用特質，更將符號語言形塑認同的動態活絡情形加以忽略避談，故無法顯現出在人類社會中認同的真正意涵。事實上，即使在社會學理論中，仍有諸如符號互動理論學者重視符號語言於社會生活的功用，強調語言等象徵符號得以改善人們對環境的認知能力、思考能力與解決種種問題的能力，同時藉由象徵符號的使用，行動者可以「扮演他人的角色」(taking the role of the other)，也就是「可以藉由象徵而超越他自己，從其他人的觀點而想像這個世界的可能模樣。」

(Ritzer, 1995/ 馬康莊、陳信木譯, 1995)；而且當代的符號互動理論，更標榜「象徵符號的使用允許人們避免為環境而奴役，因此，他們可能更為主動，而不再如此被動—也就是說，可依照他們所為自我導向」（同上）。也就是說，人們一旦以符號言說與他人進行溝通時，其實就是一種社會互動的過程，而且人們總是以帶著某些意義的符號語言與他人進行互動，並且相互註釋意義，故「雖然人們時常進行一些無心的、習慣的行為，他們的確具有參與社會行動的能力」，而且在意識詮釋過程中，「人類能夠形成新的意義和新的意義方向」（Ritzer, 1995/ 馬康莊、陳信木譯, 1995）。所以，當我們在考量認同問題時，應該重視符號語言形塑認同的實然性，以免有掛一漏萬的問題。

正如 Hall(1996)曾表明，「認同絕非本質主義所說的認同，而是一個片段與變動的過程，是使用歷史、語言以及文化資源以變成(becoming)而非是(being)某一個特定主體的過程」（Hall, 1996；轉引自翁秀琪, 2000）。同時有學者更將「認同」視為一種「關係的以及社會文化的現象」(relational and socio-cultural phenomenon) (Bucholtz & Hall, 2005)；這兩位學者指出，「認同是指涉自我或他人的社會身分的過程」，並且強調「認同是交互主體性(intersubjective)的結果而非僅是個人的產製品，同時認同是在互動過程中浮現(emergent)而非已經預先完全形成」（Bucholtz & Hall, 2005）。換言之，「認同的建構過程並非在個體內，而是在人際互動時產生『交互主體性』作用，其間涉及異同、真假及權力與『去權』(disempowerment)的互動關係」（同上）。因此，在互動時認同得以「浮現」(emergent)的產製過程中，就有機會能夠讓已被固定意義（甚或是帶有歧視意味）的指涉內涵得以鬆動，進而在互動過程中尋得經由交互主體性協商後的認同歸類（Bucholtz & Hall, 2005；轉引自曹開明、黃鈴媚, 2007）。

另外，雖也有研究者將「認同」定義區分為二類：一類的認同意義是表示「贊同」(approval)或「同意」(agreement)，是指一個主體的某個意見與另一個主體的某一意見相同或表現吻合；另一類的認同意義則是指「確認」(identification)或「歸

屬」(belongingness)，也就是經由辨識自己的特徵及與他者的差異，進而肯定自己的個體性，也從而知道自己的同類何在（江宜樺，1998、張玉佩，2000）。但筆者認為，硬將認同的意義切割成這二類，顯有顧此失彼之嫌，也不足以呈現認同的整體概念，另將“identification”譯為「確認」，也僅凸顯「辨認」、「辨識」的意思，疏漏兼具「認同」(identify with)意義的問題，³所以不適用以此區分方式來考量個人認同的概念。

故對認同問題的研究，或仍應以 Hall(1996)所建議研究認同的「辨證取徑」(discursive approach)強調出客觀建構與主體參與間兩者反覆協商的動態（Hall, 1996；轉引自李明璫，2002），也就是說認同或自我都是流變的(mobile)，因為認同是種過程而非確定的情況(Firth, 1996)。也因此，當我們在討論當代的認同型構時，與其說是固態或是種結果的認同(identity)，不如說實際上是較為接近互動協商、流動而液態的認同(identifying)（李明璫，2002）。而依照 Giddens(1991)的看法，「自我認同並不是個體所擁有的特質，或一種特質的組合。它是個人依據個人經歷所形成的，作為反思性理解的自我。……成爲一個『人』，而不僅僅是一個反思行動者，還必須具有有關個人(如用到自我和他人時)的概念」（Giddens, 1991；轉引自趙旭東、方文譯，2002）。

只是對於 Giddens 強調自我認同「是一個人以其人生經歷對自我所做的反思式的瞭解」（Giddens, 1991；轉引自夏鑄九、黃麗玲譯，2002），並將自我視爲一種「反思性計畫」(reflective project)，學者 Castells(1997)原則上同意其概念，但認爲在現代網絡社會發達情形下，個人的「反思性生活規劃」(reflective life-planning)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Castells, 2002/夏鑄九、黃麗玲譯，2002）。他並進一步指出，「現代網路社會已促使市民社會是萎縮的且彼此失去連結的」，因此在網絡社會中，「如果計畫性的認同如果終究能夠發展起來，它則是從社區抵抗所產生

³依據王志弘翻譯《社會認同》一書時，指出 identification 爲 identity 的名詞，兼有「認同」(identify with)和「辨認」、「辨識」的意思。故在一般狀況下，譯爲「認同化」。

的」(同上)。亦即主體(或是能動者)並不是在一個整體的市民社會中被形塑，而是種「社區抵抗」(communal resistance)的延長(同上)。

但筆者以為，無論是在市民社會或是網絡社會中，Gideens 的自我認同概念依然提供極佳的理解原則，即如他曾言(Gideens, 1991;轉引自趙旭東、方文譯,2002):

個人的認同不是在行為之中發現的(儘管行為很重要)，也不是在他人的反應之中發現的，而是在保持特定的敘事進程之中被開拓出來的。如果一個人要在日常世界中與他人保持有規則的互動，那麼其個人經歷就不能全然是虛構的。它表現為持續地吸納發生在外部世界中的事件，把它們納入關涉自我的、正在進行中的「故事」之中。

故依 Giddens 對於認同的看法，呈現出認同與語言的緊密連結性，所謂的認同就是自我特定的敘事方式，並形成一個關於自我與外在世界的故事。也就是說，認同絕非僅是單獨主體的想像，而是涉及自我與他人的關係的敘事故事。

值得注意的是，在強調認同的功用是有利形塑出「我群感」時，如 Castells 指陳當代網絡社會中，認同是「社區抵抗」的延伸，並認為「大部分的社會行動是在無法辨認的流動及被隔離的認同之間的對立中被組織起來的」(Castells, 2002/ 夏鑄九、黃麗玲譯,2002)，視認同僅是標示出與不同社群成員的差異性，一切都以「社區抵抗」為依歸，個人認同似乎又被固定成特定特群成員的身分表徵！但是依照本地研究顯示並非全然如此，例如有研究者已發現「網路世界造成青少年多種自我認同的可能性」(陳俞霖,2003)，以及個人在網路中能夠採取「認同抗拒」言說策略，來解構既有認同，並創造與他人重新建構認同的機會(曹開明、黃鈴媚,2007)。也因此，即使在網路盛行的當代社會中，個人認同並未失落在網路之中，反之，由於個人運用網路溝通的便利性，更利於進行認同言說行動，使認同感更具能動性。

由上述可知，認同總是與符號語言運用密不可分，尤其是在當代社會中，此種現象更為明顯；因為在社會互動的情境下，人們進行符號語言溝通行動，毋寧即是在召喚認同，以利彼此合諧互動，正如 Burke 認為人們其實就是種符號使用的動物(symbol using animal)，而且人之所以運用文字、口語或非口語的符號互動方式進行溝通，終極的目標無非就是為了「美好的人生」！（Burke, 1966；轉引自許如冰，1988）所以，人們即使是不自覺地使用符號語言時，其實仍帶有語藝的動機，是有其特定意義存在；是故，在語藝使用的概念下，符號語言無非就是為了達成認同，進而達成讓人生更美好的理想境界。

當然，當我們釐清認同是個流變的過程時，必然會進一步質疑要如何理解認同是什麼的問題，以及認同是否有助於達成人們彼此合作契機等衍生的問題意識。也就是說，我們已理解認同究竟「為何」(what)的問題後，就會追問要「如何」(how)達成的問題。因此，筆者嘗試透過語藝觀點的「認同化」概念，來標示出在言說行動中的認同論述，其實是可以達成協調人際溝通，或有助於打破社群的藩籬的作用，並取得異中求同的可能性，同時也尊重同中存異是必然的情形。以下即先對語藝觀點的「認同化」概念先加以說明。

二、有認同就有「區分」(division)

首先，就 Foss 對於語藝的定義，強調的是兩個層面的概念，一是語藝作為一種行動(action)，故涉及的是人類使用符號以達到溝通的目的；另一是語藝作為一種觀點(perspective)，牽涉到以象徵過程(symbolic process)為關注焦點（Foss, 1991；轉引自林靜伶譯，1996）。故此，本研究其實即是依此定義來探索言說符號中的認同問題，並認為語言即是一種符號行動，因為我們總是在言說中展現出特定動機籲求，藉以激勵他人與我們共享，因為我們總是在言說中展現出特定動機籲求，藉以激勵他人與我們共享，這即是語藝學者 Burke 所言的「語藝的動機」。同時值得注意的是，當我們討論語言即是行動時，重點已非聚焦於如何說服他人的表象作法，而是如何召喚人們「認同化」(identification)的架構下，瞭解人們是如何使

用語言對於人類世界加以「定義」，並用以促成合作。

也就是說，「符號行動的基本語藝功能就是在於產生認同化的作用」(Hauser, 2002)。所以，Burke 在提出「認同化」概念時其實即先提及「當你要說服一個人時，唯有你能夠使用他所說的語言，藉由言說、手勢、聲調、態度及意念等來進行相互認同」(Burke, 1966；轉引自 Poulakos, 1999)。但值得注意的是，雖說認同化可作為達成說服的一種手段，如 Burke 已將語藝關注焦點由說服轉移至「認同化」的問題，而且「認同化」就是在長期「智辯士」式(sophistic)的語藝歷史中一直被隱匿(hidden)的關鍵問題，並藉以重新發現、建構語藝的傳統(Gaonkar, 1999)。

Hauser(2002)也認為，所謂的「認同化」的基本意涵，是發生在「當我們嘗試展現我們的行事作為與他人是相同時」(Hauser, 2002)，同時他更加稱揚 Burke 所倡議的言說符號才是協調人類社會行動的核心，因為人們以語言進行溝通，其實就是在「呈現真實」(presentation of reality)，而非單純地再現或是反映真實，是故人們必需在面對時刻變化的當下言說情境，透過語言溝通來勸誘與協調社會行動，同時語言溝通也是權力的組織與投射，故人類不僅只是用語言來再現既存的真實世界，而是用語言呈現及維繫特定的世界觀(Hauser, 2002)。

事實上，Burke(1966)也曾表明「認同化」概念原意，即是說明亞里斯多德的《修辭學》所未關照到的問題，亞氏在文中著重於言者採取明確言說方法來影響受眾，但有時我們可能是直覺地、或是下意識地來進行自我說服(Burke, 1966)。也因此，在形塑個人認同時，Burke 認為，人們會自主自發性的認同他所屬的家庭、文化、宗教及國家等；他並指出，例如馬克思提出「階級意識」時，所關切的應是階級成員本身因認同化作用，下意識地造成「階級意識」的問題，因而形成實際的階級差異(同上)。

但雖說人們可能會下意識地形塑認同化，就語藝的觀點來看，這種「下意識」的作用，仍存在著言說作用的機會，如 Burke 也認為，「認同化」是可被人們有意

地形塑(Burke, 1966)，例如某甲與某乙是同事關係，即使彼此想法不同，只要某甲認為、或是被說服應要彼此認同，那麼仍有達成認同化的可能性。

也正因為個人與他者有所分別，故在個人認同中必然存有著「區分」(division)，因此語藝對於達成彼此認同是具有作用的，即如同 Burke 所強調的「如果人們彼此間沒有分別，那麼語藝就不具備什麼作用」(Burke, 1969)。所以，語藝學者 Foss(1991)在解釋 Burke 的「認同化」概念時，指出「就是因為分離促使個體與他人溝通，並解決差異所帶來的問題。因此，可以弔詭地說，認同植基於區分，而語藝嘗試克服、甚至超越不可能避免的『疏離』(alienation)問題」(Foss, 1991；轉引自林靜伶，1996)。

總之，即如 Burke 所強調，語藝並非是種神秘魔力；相對地，「語藝是語言本身特有的功能」，並且「語藝就是語言使用的一種方式」，以及「語藝是勸誘合作的符號意義」和「語藝是對符號自然回應所引導而來」(Burke, 1945；轉引自 Hauser, 2002)。因此，語藝的符號行動功能就是在於產出「認同化」，進而形塑出「我群感」的想像概念。相對地，「認同化」更具有辯證的意涵，因為在有了「認同」時也代表著「區分」(division)的存在。也就是說，語藝的作用是為在獲致認同之際，還能解決「區分」的問題，強調在異中求同之際，仍尊重同中存異的存在。甚至可以說，語藝就是為達成認同化目標，藉以協調社會行動，達成社會合諧。以下即針對語藝觀點下如何達成認同化目標加以說明。

參、語藝功能的轉向

一、促進實質共享的認同化

由於為達成認同化，就涉及如何使用言說符號的問題，因為言者使用各種語彙的動機，即在藉以調和區分與差異，當言者與聽者使用一套意義共享的語彙，就代表著他們詮釋真實時是採取著相同的概念模式，於是大家的思維理則也趨於

一致，這種在認同架構下同一性原則，即稱為「實質共享」(consubstantiality)，造成人與人之間的相互認同。

事實上，「實質共享」一詞，應是 Burke 借用自基督教神學理論的概念，就維基百科對「實質共享」一詞的解釋，是指耶穌的「三位一體」特質，也就是聖子、聖父、聖靈「合一同在」(of one being)，也與羅馬天主教強調「聖餐變體」(transubstantial)，藉由聖餐儀式實際體現出耶穌血肉要求世人警醒，是有所不同的。同時維基百科也指出，這個名詞也可用於描述為所有人們可一起分享人性的意義，就如同耶穌和聖父與聖靈「實質共享」其神聖性，所以耶穌也可與我們「實質共享」其光輝人性。⁴

因此，「實質共享」強調並非是同化而是共在，因為要認知意義全然相同實在不易，但若實質共享則有可能，就如同我們若是相信主耶穌基督，就能夠分享耶穌展露人性最光明面，相對地，我們也可以他人共同分享人性的意義。而在語藝的概念中，由於人們所說出的每句話，其實都帶有其關切，也有所界定，因而透露出認同，所以符號語言使用毋寧都是為了意義協商而非獨白式的運用，重視的是自身與他人是否能夠掌握言說契機，讓每個個體得以走向他人並尋求回應；故就 Burke 引申「實質共享」的看法，認為認同化與實質共享其實是同義詞，例如，若某 A 與某 B 彼此認同，其實就代表某 A 與某 B 在形塑「實質共享」的關係(Burke, 1969)。

進一步來說，Burke 更指出，「個體」(substance)強調僅是「行動」(act)，至於「實質共享」強調「一起行動」(act-together)的生活方式。至於所謂的「一起行動」就是代表人們得以共同感知、並形成共同想像、態度及意念，而這也就是「實質共享」(同上)。所以，人們在認同他人時，其實是處在「參與」(joined)又「分別」(separate)的情況，亦即人們在進行認同化時，個體的獨特性並未喪失，但卻又能

⁴網址為：<http://en.wikipedia.org/wiki/Consubstantial>

夠與他人「實質共享」(consubstantial)以分享相關理念、概念或是想像(Burke, 1969)。

也由於 Burke 將認同化與實質共享視為同義，並認為要達成認同化，乃是透過言說的「手段」(means)、「對比」(antithesis)的運作與「無意識」(unconscious)層次上的運作 (Burke, 1966；轉引自林靜伶譯，1996)，賦予個人認同能夠跨越外在環境、人際關係限制的可能性，於是認同不再是社會身分的標籤，其間涉及促進與他人和諧共處的言說行動的作為。

Foss(1996)即曾經歸納上述 Burke 所指稱的「認同化」的三種基本運用方式，首先，「認同化」是種達成某項目的手段(means)，亦即人們彼此可能會因現階段追求的利益相同，或是言者可提出足以讓者信服的理由，讓彼此得以共享此一實質因素，以利達成認同；其次，「認同化」可以是種對比(antithesis)的運作，是指即使原本對立或是勢不相容的各方，會因創造出共同的敵人，即可產生認同化的可能性；第三，認同化也有可能是在下意識(unconscious)狀況下運作，意指受眾可能會因接收到的各類符號訊息(諸如廣告)或是經由論述當下情境的影響，巧妙地建立起個體之間的認同化 (Burke, 1972；轉引自林靜伶，1996)。

認同化的基本運作方式，無論它是種達成目的的手段，或是在「對比」與下意識層次加以形塑，仍與論述或是敘事等言說行動有極為密切的關連性，因為認同化可能就是種實際採取的語藝策略，以達成特定的言說目的；而且即使認同化是在下意識層次中運作，前提條件也是因為存在著特定的論述文本，無論言者是有意或是無意創造出這些文本，都是為了吸引受眾的認同化回應，並總是以論述或是敘事等言說行動來表達出彼此的確存有「實質共享」的部分。

但值得注意的是，像是有研究者指出，言者是為了說服他人時，涉及必須採取所謂社會主流價值判準，以利達成「實質共享」，故言者必須瞭解且妥協於受眾的思想、特質，才能引導受眾的思想，並加以說服 (王孝勇，2005)；甚或還有研究者認為，Burke 所提出的認同化的概念，其實仍是為了達成說服的目的 (Burke,

1966；轉引自 Desser, 2001），這可能只說出 Burke 提出「認同化」的狹義概念，因為促成實質共享的認同化過程，並非只是言者要達成說服的「境界」！筆者希望進一步指陳的是，說服雖是語藝功能的重心，即如前述 Hauser 所指出，當代語藝已聚焦於探討如何以言說達成「認同化」而非僅是說服而已(Hauser, 2002)，所以重點應是瞭解如何達成實質共享，以促進社會共識形成或是調和行動，而非純為說服他人而已。

換句話說，即如 Hauser 所言，語藝功能已然轉向，與其說語藝是為了達成說服的目的，不如說是為了促進認同化的達成，並獲致實質共識與促成一致行動。因為論及「說服」一詞，可能容易受到傳統語藝觀點的影響，仍以亞里斯多德提出的「人格可信度訴求」(ethos)、「感性訴求」(pathos)及「理性訴求」(logos)等三種藝術證明方式為依歸，或是思及大眾傳播理論中言者向聽者傳播的線性傳播模式以及傳統社心理論討論宣傳效果概念，凡此種種概念，重點仍是以言者為導向；但是，當代語藝思維的認同化概念，更重視的是聽者，認為言者與聽者是彼此互動作用的，也才有可能產生實質共享。

而且即使將認同化視為一種達成言說目的的手段，言者與聽者其實都同受影響，因為認同化其實是個互動過程，而非是單向的灌輸，即使硬是指稱實質共享的認同化過程就是說服，那也是言者與聽者相互進行說服的過程！因此，倘若我們只標榜言者為達成說服目的就是語藝功能的重點，毋寧是侷限語藝發展的可能性與其實質作用。

如同語藝學者 E.Bormann 在提出其「符號融合理論」時，也曾強調言說符號不僅為個人創造真實，且使得個人賦予的符號意義能進一步與他人進行融合作用，進而產生成員間共享的真實(consubstantiality)（轉引自郭俊池,未發表）。因為 Burke 強調「語藝最主要目的是達到分離個體的『實質共享』，進而產生認同、彼此隸屬感(belonging)」(施懿珊, 2002)。換句話說，重視實質共享的言者是要「先與聽眾站在一起、認同他們，聽眾才會與言者站在同一邊」(朱元鴻, 1993)。

Foss 就指出，Burke 是透過認同化造成態度或行為的改變，擴充了語藝的概念，但不意味「認同化」將取代傳統慣用的「說服」一詞（Foss, 1991；轉引自林靜伶，1996）；因為認同化過程所產生的說服力量，其實可能已非是言者的原意，而是聽者與言者相互作用後的產物（Desser, 2001）；因此說服與認同化間並非存有牢不可破的因果關係，因為我們實在無法推估每次言者欲經由認同化過程說服聽眾時，所得結果已是他原本所預期，因為言者可能已在與受眾進行認同化過程中，反而在某個程度上已經被加以說服，因此重點在於是否達成了實質共享；畢竟，人們在進行言說互動之際，總要能夠彼此認同，才有產生說服的機會，甚至人們是以感性理由（諸如喜歡某人、當時心情好壞與否等）才有被說服的可能，而不會被純然理性訴求因素所說服，因此尋求認同化比較符合日常生活人際溝通情形。

在言者與聽者進行認同化過程中，是相互運用言說行動進行符號交流，並在有意識或是下意識情況下達成實質共享的合作機會。因此，筆者以為，Burke 指陳出「實質共享」的認同化方式，進而達成說服目的時，強調的是說服是言者在聽者互動過程中形塑而來，不應採取傳統修辭僅重視言者如何運用言說形式策略而已，而是言者總是要實際理解受眾的需求，那麼認同化才有可能達成，並透過語藝讓言者與聽者間可超越「區分」與「疏離」的機會。

如同 Hauser(2002)所言，認同化其實是個「辨證式的語詞」(dialectical term)，也就是當認同化發生時，相對地就有「區分」存在。至於語藝的功能就是「為了克服或是補償『區分』的存在」，而且這個認同化克服區分的過程是持續不斷的（Hauser, 2002）；因為語藝就是為了在面對「不尋常事發生」(something unusual happen)之際，諸如該發生之事未發生，或是不該發生之事卻發生時，能夠採取符號語言進行作用。因此，這不只為迎合受眾進行認同化，更是言者創造出認同化的可能性，以實際克服或是補償人與人之間，因進行認同所需面對的「區分」問題。

也因此，Burke 或可說開啓了我們理解語藝功能的另一個視界，即使是論述的表現形式(form)，諸如使用對比、隱喻或敘事等言說方式，其實就 Burke 的觀點，

其實都涉及受眾的企求或撫慰等心理感受(Burke, 1968)，故語藝使用毋寧是爲了異中求同。但不可諱言的是，因著彼此認同，會產生僅強調事件某個面向而忽視其他可能性的所謂「終點的視界」(terministic screen)的問題，或是因著人們這種獨特使用符號（或誤用符號）的能力，造成人們不斷地認同、區分與再認同及再區分之際，有引發「誤認」(misidentification)的可能！也就是說，因爲言者的言說，造成聽者誤以爲言者與自己的言說立場是一致的，可是實際上卻是相左的狀況發生(Hauser, 2002)。

針對此一誤認問題，也是本研究會提出以 Bakhtin 的「美學時刻」理論概念加以補強「認同化」的實際作用，並且會在下段中加以說明可資因應方式。但在解決此一問題之前，必需進一步理解的應是「如何」達成實質共享，進而促成社會共識或是調和行動，畢竟每個人均有其言說的動機，首要應該要避免的是「各說各話」造成絲毫沒有交集的可能。當然，在這些問題上，Burke 或已提出要達成實質共享可透過言說的「手段」(means)、「對比」(antithesis)的運作與「無意識」(unconscious)層次上的運作等三種基本運用方式，作爲達成「實質共享」必然涉及論述的表現形式(form)，但在說明「如何」達成實質共享促進人際間調和行動時，仍有不夠明確之憾。

因此，筆者認爲 Bakhtin 所提出「對話主義」理論中的「美學時刻」相關概念，或可提供解釋，因爲 Bakhtin 認爲，在對話中「若只有統一而又獨一無二的參與者時，不可能出現審美的事件」(曉河、賈澤林、張杰、樊錦鑫譯，1998)，因爲就 Bakhtin 的概念，「審美存在只有作爲我給予他人的賞賜或他人給予我的賞賜才可能實現；無論是我還是他人，若僅從自己的內部出發，不與他人進行互動，則無法實現審美事件。」(蕭淨宇，2007)是故，Bakhtin 的理論說法是可與 Burke 的認同化概念相互接軌，有助於說明語藝中的「認同化」概念。

二、「美學時刻」式的認同化

即如前述，Burke 提出的認同化概念，原即具有辨證意涵，同樣地，「實質共享」的概念，也不在於強求同化而是在追尋共享，強調的更是「一起行動」(act-together)的符號作為，企望人們可經由言說獲致共同感知、想像、態度及意念，這是現代社會社群生活得以運作的重要原由，然而我們若要仔細釐清個人認同究竟為何時，可能 Burke 的「實質共享」概念，仍不足說明箇中原由，所以需要其他理論概念加以說明，並認為 Bakhtin 的「對話主義」理論相關概念可作為補充說明。

「對話主義」一詞並非是 Bakhtin 所自創，而是 Holquist(1990)觀察到 Bakhtin 的學說中，是以「對話」(dialogue)概念貫穿所有論點，因而以「對話主義」來形容 Bakhtin 對人類使用符號語言的特徵(Baxter, 2004)。然而，以「對話主義」直指 Bakhtin 的思維核心卻可謂貼切。因為在 Bakhtin 看來，「話語是語言交際的最基本的單位，語言真正的生命在於話語」(蕭淨宇，2007)，而且 Bakhtin 也自陳：「一切話語都具有內在對話性，和對話(指狹義的對話)的外在布局形式」(白春仁、曉河、周啓超、潘月琴、黃玫譯，1998)，故在 Bakhtin 使用這種「超語言學」的方法，強調「在每一個表述中—無論是對話中的對語還是獨白語—都充滿了他人話語的回應。這些回聲的形式和特徵是多種多樣的，語言學要研究的，是這些形式的普遍類型。」(白春仁等譯，1998)也就是在一個文本中一個個獨立又相當交流的多樣話語對話中，構成 Bakhtin 所謂的「複調對話」，而且「在這種複調中，每個聲音都是主體的，都是獨立的。它的最大限度是顯示出人與人之間平等、自由的交際關係」(蕭淨宇，2007)。

進一步來說，Bakhtin 對於言說中存有言者意識形態的看法與 Burke 對於符號行動的看法也是相互呼應的(Herrick, 2006)，而且 Bakhtin 強調「人類只有依托語言才能生存、思考與交流」(蕭淨宇，2007)的核心思維，正與 Burke 強調語藝促成認同化、以獲致實質共享的觀點不謀而合。筆者認為，Burke 語藝理論論及認同化

概念時，其實與 Bakhtin 在其「對話主義」理論提出的相關概念確有互補之處。

首先，Bakhtin 在說明個人與他人間的關係時，強調的是「外位性」(outsideness) (Emerson, 1997)；所謂的「外位性」是指「我在自己之外看自己」，而這又必須依賴於他人，因為「外位性決定了我能在他人身上優先看到那些東西。⁵而 Bakhtin 也曾指出：「在審美活動中，我和他的關係是絕對必須的，因為『一個人在審美上絕對地需要一個他人，需要他人的觀照、記憶、集中和整合的功能性』」（曉河等譯，1998）。由此可知，個人與他者互動時，並非是放棄自我特質來認同他人，而是每個人均有一個特殊的位置，卻又能彼此互補，即如 Bakhtin 所言，「唯有在他人的世界裡，才可能出現審美的、情節的、自成價值的運動」（曉河等譯，1998）。在此，Bakhtin 其實也已提供前述因認同造成「終點的視界」(terministic screen) 缺失問題的解答，因為每個人的視見實在無法周全，唯有跳脫自我來審視自我與他人的關係，那麼實質共享的認同化才真得有可能發生。

其次，Bakhtin 提出「美學時刻」概念，重點即是標榜出人際「圓滿」(consummation) 的組成概念(Bakhtin, 1990)，正足以強調出與運用語藝促成認同化的概念，誠如 Baxter(2004)所強調，Bakhtin 所指陳的「美學時刻」，所強調的是不同於黑格爾「正—反—合動態」(a thesis-antithesis- synthesis dynamic) 以到達一個理想的和諧或終止狀態；相對地，Bakhtin 主張變動是一種不斷的質和量之轉變，不必然導向一個理想的終止狀態，通常只是到達一個不同於現狀的狀態，而這種不同於現狀的狀態，即是一種「美學時刻」(Bakhtin, 1990；轉引自黃鈴媚、曹開明，2007)。

同時 Baxter(2004)也指出，「美學時刻」是一種「稍縱即逝的整體性時刻」(a

⁵依據錢中文〈理論是可以常青的一論巴赫金的意義〉一文指出：「超視說的是我作為『自己眼中等我』，是一個積極性主體，『視覺、聽覺、觸覺、思維、情感等積極性的主體』。『我所看到、了解到的、掌握到的，總有一部分是超過任何人的，這是由我在世界上唯一而不可替代的位置所決定的。』在這個特定世界上，此時此刻唯有我處在這個位置上，所有其他人都在我的身外，這就是我的具體的『外位性』。但是這個外位性，不是孤立使自己超越於他人。(轉引自方素真，2004)。

fleeting moment of wholeness)，所以它所創造的是「暫時性的完成、完整或整體性」(Baxter, 2004；轉引自黃鈴媚、曹開明，2007)。由此可推知，「美學時刻」其實正具備了進行語藝言說時重視「契機」(kairos)與 Burke 所強調「實質共享」的意涵。⁶甚至可說，Bakhtin 較 Burke 更為重視「當下」(here and now)對話情境與過程，希能獲致能夠跳脫現有認知框架可能性，並進而達成認同化。

此外，「美學時刻」也說明認同化是種過程的特質，重視「如何」在不斷流變的人際互動過程中達成認同化的方式。並藉由在持續互動的過程中獲致這種美學時刻，以在異中求同之際，又能符合同中存異的實際人際互動溝通特質。

故「美學時刻」的發生原由，正因人們進行言說對話時，心中存有這種人際溝通時必要的倫理思維，知曉應採取視他人為完整、平等的個體、願意傾聽與運用移情作用等方式讓人際對話方得以產生意義，並得以脫離總是因言說動機「各說各話」缺乏交集的窘境；也就是說，Bakhtin 所指涉的倫理觀，是來自於日常生活人們互動時所必需，正因為人是群居動物，衍生相關行為準則，這即是倫理發生來源，也進而促成「美學時刻」得以發生的可能性。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Bakhtin 與 Habermas 雖都共同關注於言語(或言語行為)(蕭淨宇，2007)，但由於 Habermas 的理性對話與公共領域概念並非實在存有於現實的日常生活中，甚至只是種「準烏托邦」的社會互動溝通典範，Habermas 認為，個人倫理觀念是有其普世通用性，但其倫理觀過於理想化難以具體呈現；相對地，Bakhtin 強調的是日常生活世界中的行動，才是倫理得以形塑的唯一場域(Gardiner, 2004)。而且我們也不用苦苦等待如 Habermas 所構築的「溝通的黃金年

⁶由於進行語藝言說時，必需重視面對場合、受眾與言者的適當問題，而有「適當」(appropriate)即暗示有著「不適當」(inappropriate)。作為言者，必需理解兩者以利獲得尊重及不致冒犯聽者。故言者必需領會在適當時機進行爭論(不要「白目」地和他人抬槓)，這即是所謂的「契機」(kairos)(含有「適當時間」與「正確衡量」的意義)，亦即是知曉如何適時適地去說話，而且也知道何時要保持緘默，更知道什麼時機可以展開新的爭論，如此才能受眾願意接受及加以回應。

代」再度降臨，因為人們已有機會在社會化過程中，擁有在社群生活中的言說智慧，端視我們能否善於運用。

至於實際上要如何讓這種美學時刻出現，根據 Emerson(1997)綜整 Bakhtin 對於美學與倫理的論點，⁷認為 Bakhtin 是採取「獨特性」(singular)、可回答性(answerability)、值得回應的參與(response-worthy participation)以及美學性熱愛(aesthetic love)的原則，作為審視世間人事物的標準(Emerson, 1997)。Baxter(2004)則進一步引申是否屬於 Bakhtin 的「美學時刻」所必須符合的三項原則。

首先，所謂的「可回答性」是指個人對於他人成為一個作者(author)或是實現自我負有道義責任，也就是人總是相互幫襯以言說來尋求實現可能的自我(Baxter, 2004；轉引自黃鈴媚、曹開明，2007)。故所謂的「可回答性」，毋寧是對 Burke 強調實質共享時的「一起行動」(act-together)概念，給予人們日常生活倫理的定義，也就是人們一起行動時，我與你之間還有一層道義責任，這是每個人無可迴避的人生義務，我們除了以符號言說相互尋求慰藉外，還更希望以言說行動讓彼此生活更為圓滿。

其次，「值得回應的參與」則有助於個人的作者身分(authorship)形成，這是透過美學的「同理心」(empathic)來回應他人，因而獲致「視域剩餘」(surplus of seeing)的益處。⁸是故，個體透過參與回應他人言說之際，是為能以移情作用方式認同、理解他人並希望以視域剩餘方式形成整體感(同上)；在此，所謂的「值得參與的回應」，與 Burke 強調在認同他人時，其實是處在「參與」(joined)又「分別」(separate)的情況有關，因為 Burke 認為人們在進行認同化時，個體的獨特性並未喪失，但

⁷ Emerson 指出，由於 Bakhtin 對於「美學時刻」的概念說明，流於隨意並不嚴謹，但依據俄國學者(如 Volkova, Makhlin, Gogotishvili, Bonetskaia)研究認為，Bakhtin 的美學及倫理思維，源起出人際間相互的「剩餘性」(surplus)及「補充性」(supplementary)的作用。

⁸ 依據劉康在其《對話的喧聲——巴赫汀文化理論述評》一書中指出，「視域剩餘」指稱的是每個個體都有其觀看世界的盲點，但卻可以被他人所看見，因此「這種個體視域的特、不可替代和互相依存、互相補充，即為每個人擁有的『視域剩餘』。」

卻又能夠與他人分享相關理念、概念或是想像，而 Bakhtin 則明確詮釋出為何人們能夠彼此有所「分別」的情形下，得以「參與」他人，那是因為人們具有移情作用，因而觸發「視域剩餘」作用，使自己因與他人互動對話而有所受益，此種如同孔子言：「三人行必有我師」的理念，也讓 Burke 的實質共享的認同化概念更具意義。

第三，至於「美學性熱愛」是指個體全心投入熱切互動並交織回應，並視彼此為全人，而非只在某一面向互動的不完全個體（同上）；在此即如前述，由於 Bakhtin「終其一生是一名東正教教徒」（蕭淨宇，2007），而 Burke 除在論著引申宗教語彙說明其觀點外，晚年的「研究旨趣已從詩學轉變成神學，視神學為理學模式或語言的研究」（林靜伶，1996）。

故 Bakhtin 提出「美學性熱愛」觀點，強調人際互動時必需互敬互愛，並應以倫理作為人際互動依歸，其實與 Burke 帶有神學意涵的「實質共享」的認同化概念正是不謀而合，進而昭示出《聖經》要人「愛上帝，愛鄰居」時，人不僅領承了通向神性世界的鑰匙，同時也領略了人世間價值的真實內容（Buber, 1991/ 陳維剛譯，1991）。正因兩人都以神學中「愛」的理念來審度人際互動關係，也讓運用語藝策略達成認同化的目的更有意義，因為語藝的目的不只為說服他人，而是以人性關懷為出發點，希望彼此都能趨向於良善。

即如同 Bakhtin 對於對話的闡釋與 Martin Buber 在其闡釋如何以調解方式在上帝與人、人與我間獲得平衡關係的著作《我與你》一書中，對“我與你”關係的闡釋相近（蕭淨宇，2007）；因為兩人都認為人是透過言說會語與他人「相遇」（meeting, encounter），即如 Martin Buber 所言：「沒有任何事物本是現成的經驗，它必在與相遇者之交互作用中呈現自身」，同時「生成之『你』實現於與相遇者之親身體驗的關係中」（Buber, 1991/ 陳維剛譯，1991），也就是說，那個屬於每個人心性中具備可與萬物同化的「你」，必需是透過對話才得以獲致，更是「我」與「你」關係(relation)得以建立原因，「故有謂 Martin Buber 思想是『交談哲學』或『對話

哲學』」(Buber, 1991/ 陳維剛譯, 1991), 也顯見 Bakhtin 的對話主義理論貼近此種強調人我和諧溝通的哲學思維。

進一步來說, Herrick 也曾指出, Bakhtin 視各種言說論述其實都是種「自我揭露」的過程, 因為語言不只是反映客觀外在世界, 而是人們用語言共同參與建構這個世界(Herrick, 2005), 至於 Martin Buber 則強調「並非語言寓於人, 而是人棲居於語言, 人站在語言當中向外言說, 因此每一言語皆是如此, 每一精神皆是如此」(Buber, 1991/ 陳維剛譯, 1991)。所以, 對照 Bakhtin 的「對話主義」理論與 Martin Buber 的「對話哲學」同樣都點明符號語言建構真切有意義的人際關係實為重要。

也就是說, Bakhtin 與 Burke 對於符號語言的觀點, 其實與 Martin Buber 強調「『我』與『你』相依共存, 每個人皆可稱述『你』而仍為『我』, 亦即每個皆可讚頌父而仍為子, 實在性永永不滅」(Buber, 1991/ 陳維剛譯, 1991) 的概念相呼應, 因他們三人都是透過宗教神學背景意涵, 來描繪日常生活的人們, 實有彼此合諧共存, 共創認同化的可能。

總的來說, Bakhtin 的「對話主義」理論重視個人與他人的互動對話, 其中涉及的是「可回應性」(answerability), 因為人們總是在對話中才得以讓倫理觀形成, 而非單純地由個人的「認知言說思維」(cognitive-discursive thoughts)中即可獲得, 因此人們總是在對話中讓知識體系價值得以形成(Gardiner, 2004)。同時, Bakhtin 強調人生變幻與日常生活實情, 在這種流變的人際互動中, 重視的是「美學式的回應」(authentic answerability)的倫理觀; 標榜日常生活、注意特殊情境下的「實際」理性, 而非是根據普同性或是「去情境化」的「真理」(truth)。

值得注意的是, Bakhtin 的對話主義理論並非全然迷戀於生活經驗特質或是反對抽象理論; 相對地, 他更注重理解歷史與社會文化發展的鏈結情形。就 Bakhtin 的概念而言, 各種社會現象均非既定唯一的, 而是對話協調出多種可能之一(同上)。由此可推論, 當我們在追尋個人認同時, 總是需要透過「外位性」的概念,

與他人進行對話，於是個人認同也總是在對話過程持續流變，也就是持續進行「認同化」的作用，並企望獲致「實質共享」的可能。

易言之，Bakhtin 的對話主義理論提供審視認同新的思維視域，即如前述言說論述等符號行動與認同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同時 Bakhtin 更指陳出言者並無法明確控制語言，由於語言有其多義性，每個字的字義都無法為個人所完全掌控，所以言說是無法歸屬於任何個人或團體，而是人們投入參與的結果(Gardiner, 2004)。也就是 Bakhtin 重視的是「誰在說」和「誰」在進行對話（蕭淨宇，2007）。是故，認同是與他人合作、參與對話所獲致的觀點，所以並非是全為理性，更含有感性成分在其中。

藉由上述說明可知，認同的作用並非促成靜態固定的身分類歸而是種認同化的過程，其中關鍵則是需要經由與他人對話時尋求「美學時刻」產生認同化的可能性。因此，當 Burke 強調「實質共享造成人與人之間的認同化」時（Burke, 1966；轉引自林靜伶，1996），或許我們應能再予以推知，「美學時刻」與「實質共享」實具有因果關係存在，而我們總是採取符號行動與他人進行對話，期能引發出「美學時刻」，進而才能可能彼此「實質共享」。也因此，當我們希望促進具有實質共享的認同化，首要工作應即是在對話中採取上述達成「美學時刻」的原則，以符合實際日常生活中進行個人認同又能達成社群合諧的需求。

肆、代結語—撫平本土認同焦慮的可能性

既然我們已推論出語藝觀點下認同是個持續流變的認同化過程，在此或已足能回應於前言中提及網友 vegetarian 提出的個人認同焦慮問題，也就是在面對或處理認同問題同時，可在言說對話中採取達成 Bakhtin 「美學時刻」的原則，即有解決相關認同焦慮與克服差異與疏離的機會。進一步來說，結合 Burke 的「實質共享」概念與 Bakhtin 的「美學時刻」概念，確實可作為理解個人認同與人際溝通的語藝理論依據，並能提供研究者及民眾在實際面臨認同問題時的可採取之因應思

維觀點。

由於語藝所展現出的力量就是種社會實踐，但與其說這種社會實踐就是種說服他人的力道，不如說是運用語藝來尋求「認同化」的契機，也就是運用言說來創造實質共享的美學時刻。換句話說，所謂的「認同化」是為創造彼此同在且共享符號語言的愉悅趣味，故認同化是種過程，會因人、因情境有所變化，但也因人們總是不斷地提出各種言說策略以達成認同化，確實有利於創造社群共識與促進社會行動，藉以消弭彼間的「差異」。

尤其在釐清如何達成認同化的原則後，或能提供重新理解本土相關認同焦慮問題的方向。在臺灣社會中，每個人或多或少都必需都面對關於統獨、省籍等認同問題，或有人認為這是個無解的難題，但以 Burke 的概念來看待這些認同問題，或會認為這是「生命中『未結束的對話』(unending conversation)」(Burke, 1941；轉引自林靜伶，1996)，而且人們猶如是在無所不在的會議室(parlor)中，進行一場又一場可能沒有起點，也可能沒有終止的認同對話論辯。

正因 Burke 已看出人們的生命就是場無止盡的對話，各種議題原即沒有所謂終極的答案，但透過對話的過程卻讓人們感覺到自身存在的價值，知曉自己並不孤獨。是故，Burke 指陳出認同化即是實質共享的概念，即是為強調人們參與對話的重要性，更涉及到應採取何種言說策略與他人達成實質共享的可能性。

相對地，依循著 Burke 的概念，代表我們或許得不到一個解決台灣在地統獨爭議或是其他相關社會認同、個人認同的最終答案，甚至也再度證明認同問題可能也無法純然用理性溝通方式即可解決，但畢竟，我們曾以言說行動參與其中，即代表我們的文化自覺與實質存在，⁹並產生許多意義可供解讀，這毋寧就是種文

⁹人類學者費孝通先生在其《論人類學與文化自覺》一書中提及：「文化是流動和擴大的，有變化和創新的。個人是一個文化的載體，但也是在文化的不斷創新中成爲的變體」。同時費孝通提出「文化自覺」觀念，作爲解決當今世界紛擾之道，亦即是強調久已隱藏於中國文化中的「和而不同」道理，來審視與理解文化衝突的問題。

化行動力。

當然，如此的解釋，或還不足以撫平相關的認同憂慮，因此，Bakhtin 的「美學時刻」概念，可給予進一步的對話原則指導。既然透過語藝功能與策略進行認同化就是個社會化的過程，並著重如何與他人對話的問題，倘若我們均能知曉 Bakhtin 指陳出的個人與他人間有著密不可分的作用關係，同時個體也總是佔有一個獨特理解人事物的位置，就可以體悟到，原來認同化過程中的紛紛擾擾，其實才是人類社會的常態而非病態。如此一來，我們就可以樂觀態度來看待台灣本土社會的認同問題，除認為這是台灣市民社會「眾聲喧嘩」式民主與活力的表徵；進一步還有機會隨著人際互動間必要的倫理前提下，運用言說策略原則獲致社會調合的最大公約數，一方面能夠異中求同，另一方面也尊重同中存異，能減少無謂認同紛爭，進而享受合諧實質共享的愉悅性。

總之，透過探索語藝觀點下的認同化概念，重點是在於釐清我們所要的追尋的是達成實質共享的美學時刻的可能性；畢竟，「我們不僅是生活在同一個世界中，我們還與其他人相互參與彼此的存有」(Merleau-Ponty, 1973)，而人們得以相互參與彼此的存有，則正如 Buber(1958)所強調，是發生在人們「相遇」(happen)於「真正的」(real)的言說對話中 (Buber, 1958；轉引自 Cissna & Anderson, 1998)。特別是在網路盛行的當代社會中，人們掌握了較以往更強的言說自主性，因為當前的電子時代中首要發展特徵，即是「大眾語言的興起」，且這種「普遍共用的『大』語言…在千萬人的心田間闢一共同會晤的場所…」(沈錦惠，2005)。可以想見，這個社會確實就如同一個大型會議室，透過各種傳播管道，我們的言說有更多機會與他人言說進行交融，但重點已不在於說服他人，而是用他人想法來彌補我們自身的不足，並得以讓我與他人於言語相遇之「道」上，朝向不可言喻、與萬物同化之妙境一同邁進。當然，Burke、Bakhtin 及相關研究他們學說的學者，經歸納、引申後，已提出切實可行的認同化作爲，如今爲讓人際溝通互動的倫理觀得以正確建立，還要透過推廣媒體識體與倡導語藝教育，或更能有助於促成在地社群間彼此實質共享認同化的可能性。

參考文獻

- 王孝勇（2005）。〈呂秀蓮自我辯護策略的類型批評〉，《新聞學研究》，79。
上網日期：2007年10月5日，取自<http://www.nccu.edu.tw/mcr/0082/001.html>。
- 方素真整理（2004）。〈巴赫金論行爲哲學〉，中興大學歷史系文本分析讀書會。
上網日期：2007年9月18日，取自
<http://benz.nchu.edu.tw/~chenlin/text4/text4-record5.pdf-52k-..>
- 白春仁、曉河、周啓超、潘月琴、黃玫譯（1998）。《巴赫金全集》第四集。石
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 朱元鴻（1993）。〈正當的(只不過是)語藝：從前蘇格拉底到後尼采〉，《傳播文
化》，1：81-102。
- 江宜樺（1997）。〈自由民主體制下的國家認同〉，《台灣社會研究季刊》，25：
83-121。
- 李明璫（2002）。〈宰制?自主?或兩者皆非：「哈日」研究的方法論反思〉，《文
化研究月報》，14。上網日期：2007年10月12日，取自
<http://www.ncu.edu.tw/veng/csa/journal/journal-perk93.htm>。
- 沈錦惠（2005）。〈社群之知VS客觀之知：從電子口語看電子新聞〉，《新聞學
研究》，82。取自<http://www.nccu.edu.tw/mcr/0082/001.html>。
- 林靜伶（1996）。《當俄語藝觀點》。台北：五南。
- 施懿珊（2002）。《李登輝總統言論之戲劇觀—從柏克戲劇五因語藝觀點分析》。
世新大學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 許如冰（1988）。《修辭認同之理論與實際—雷根國情咨文演說之修辭分析》。

文化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 翁秀琪（2000）。〈社會結構、語言機制與認同建構—大眾媒介如何「編織」美麗島事件並構塑民眾的族群與國家認同〉，《傳播研究集刊》，4：1-162。
- 陳明珠（2002）。〈媒體再現與認同政治〉。（2002年中華傳播學會研討會論文）。上網日期：2007年9月4日，取自
http://ccs.nccu.edu.tw/UPLOAD_FILES/HISTORY_PAPER_FILES/330_1.pdf。
- 陳俞霖（2003）。《網路同儕對N世代青少年的意義：認同感的追尋》。嘉義：南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出版。
- 郭良文（1997）。〈台灣近年來廣告中認同之建構—解析商品化社會的認同與傳播意涵〉，《新聞學研究》，57：127-157。
- 郭俊池（2004）。〈視病猶親的空中診所：台語廣播電台賣藥與老人族群媒介使用之接收分析—以幻想主題分析途徑〉。未發表之研究報告。
- 黃鈴媚、曹開明（2007）。〈意義的建構、解構以及共構：語言實踐與文化的辯證關係〉。未發表之研究報告。
- 曹開明、黃鈴媚（2007.08）。〈日常談話中的認同抗拒策略：以「無名小站」網誌「台客」認同論述為例〉。「2007年中華傳播學會研討會」。台灣：台北。
- 張玉佩（2000）。〈當認同遇到隱喻：談隱喻在認同塑造的運作〉，《新聞學研究》，64：73-101。
- 費孝通（2004）。《論人類學與文化自覺》。北京：華夏出版社。
- 劉映晨（2004）。〈從族群認同危機看原住民青少年社會網絡〉，《網路社會學通訊期刊》38。上網日期：2007年10月2日，取自

<http://www.nhu.edu.tw/~society/e-j/38/38-07.htm>.

劉康（2005），《對話的喧聲—巴赫汀文化理論述評》。台北：麥田。

鍾蔚文（2004）。〈想像語言：從Saussure到台灣經驗〉，翁秀琪（編）《台灣傳播學的想像》，199-264。台北：巨流。

曉河、賈澤林、張杰、樊錦鑫譯（1998）。《巴赫金全集》第一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蕭淨宇（2007）。《超越語言學—巴赫金語言學哲學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Antaki, C. & Widdicombe, S. (1998) Identity as an Achievement and as a Tool. In C. Antaki & S. Widdicombe (Eds.), *Identities in talk* (pp. 1-14) . London: Sage.

Bakhtin, M. M. (1973) *Marx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Matejka . & Titunik, I. R. Trans.). New York: Seminar Press.

Bakhtin, M. M. (1990) *Art and answerability: Early philosophical essays by M. M. Bakhtin* (M. Holquist & V Liapunov, EDS.: V. Liapunov & k. Brostrom, Trans.). Austin: Texas University Press.

Baxter, L. A. & Montgomery, B. M. (1996). *Relating: Dialogues and dialectics*. NY: Guilford Press.

Baxter, L. A. (2004). Relationships as dialogues. *Personal Relationships*, 11: 1-22.

Buber, M. (1991). 《我與你》(*I and Thou*)（陳維剛譯）。台北：桂冠。（原作1958年出版）。

- Buber, M. (1958). *I and Thou* (2nd ed.; R. G. Smith, Trans.). NY: Scribner.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23)
- Bucholtz, M. & Hall, K. (2005). Identity and interaction: A sociocultural linguistic approach. *Discourse & Society*, 7(4-5): 585-614.
- Burke, K. (1941). *The Philosophy of Philiosophy of Literary Form: Studies in Symbolic Action*. Baton Rouge: Louisiana University Press.
- Burke, K. (1945). *A Grammer of Motive*. New York:Prentice-Hall.
- Burke, K. (1966). *Language as Symbolic Action*. Berkeley,Ca: California Press.
- Burke, K. (1968). *Counter-Statement*. Berkeley,Ca: California Press.
- Burke, K. (1969). *A Rhetoric of Motives*. Berkeley,Ca: California Press.
- Burke, K. (1972). *Dramatism and Development*. MA: Clark University Press.
- Burke, K. (1989). *The Legacy of Kenneth Burke* Wisconsi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 Cissna K, N., & Anderson, R. (1998). Theorizing about Dialogic Moments: The Biber-Rogers Position and Postmodern Themes. *Communication Theory*, 8(1): 63-104.
- Castells, M. (2002). 《認同的力量》 (*The Power of Identity*) (夏鑄九、黃麗鈴譯)。台北：唐山。(原作1997出版)。
- Desser, D. (2001). Reading and Writing the Family: Ethos, Identification, and Identity in my Great-Grandfather's Letters. *Rhetoric Review*, 20: 314-328.

- Emerson, C. (1997). *The first hundred years of Mikhail Bakhti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Firth, S. (1996). Music and Identity. In S. Hall & P. du Gay (Eds.), *Questions of cultural identity* (pp. 108-127). London: Sage.
- Foss, S. K., Foss, K. A., & Trapp, R. (1991).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on Rhetoric*. Prospect Height, ILL: Wavland Press.
- Gaonkar, P. D. (1999). In Lucaites, J. L. & Condit, C. M. & Caudill Sally (Eds.), *Contemporary Rhetorical Theory*. (pp.194-212). NY: Guilford.
- Gardiner, M. E. (2004). Wild publics and grotesque symposium: Habermas and Bakhtin on dialogue, everyday life and the public sphere. *The Sociological Review*. 52(s1): 28-48.
- Giddens, A. (1991) *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 Self and Society in the Late Modern Ag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Giddens, A. (2002)。《現代性與自我認同：晚期現代的自我與社會》(*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 Self and Society on the Late Modern Age*) (趙旭東、方文譯) 。台北：左岸。(原作 1991 年出版)
- Hall, S. (1992). The question of cultural identity. In Hall, S., Held, D. & McGrew, T. (eds.), *Modernity and its futures(chapter6)*.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Hall, S. (1996). Introduction: Who needs identity? In S. Hall & P. du Gay (Eds.), *Questions of cultural identity* (pp. 1-17). London: Sage.
- Hauser, A. G. (2002). *Introduction to Rhetorical Theory: 2nd Edition*. Prospect Height:

Waveland.

Herrick, J. A. (2006). *The history and theory of rhetoric: An introduction* (2nd ed.). Boston: Allyn & Bacon.

Holmes, J. (2005). Story-telling at work: A complex discursive resource for integrating personal, professional and social identities. *Discourse Studies*, 7(6): 671-700.

Jenkins, R. (2006)。《社會認同》(*Social Identity*) (王志弘譯)。台北：巨流。(原作1996年出版)

Merleau-Ponty, M. (1973). *The Prose of the world* (C. Lefort, Ed; O'Neill, J., Trans.). Evanston, I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Poulakos, J.(1999). Toward a Sophistic Definition of Rhetoric. In Lucaites, J. L. & Condit, C. M. & Caudill Sally (Eds.), *Contemporary Rhetorical Theory*. (pp. 25-34). NY: Guilford.

Ritzer, G.(1995). 《社會學理論》(*The Sociological Theory*) (馬康莊、陳信木譯)。台北：巨流。(原作 1992 年出版)

Tracy, K. (2002). *Everyday Talk: Building and Reflecting Identities*. NY: Guilford Press.

Widdicome, S. (1998). Identity as an analysts' and a participants' resource. In C. Antaki & S. Widdicome (Eds.), *Identities in talk* (pp. 191-206). London: Sage.

SEEKING UNITY IN DIFFERENCES OR SEEKING CONVERGENCE WHILE RESERVING DIFFERENCES? - PROBING AND CONCEPTUALIZING 'IDENTIFICATION' WITH THE PERSPECTIVE OF RHETORIC

Kai-Ming Tsao

《Abstract》

This article employs the perspective of rhetoric to scrutinize the identification issue. Through combining Kenneth Burke's concept of identification and Bakhtin's theory of dialogism that identifies the 'aesthetic moment', the author intends to lay emphasis on the possibility of attaining consubstantiality via human interaction or discourses. Thus, the communication can actively penetrate the superficial issues. It indicates that the exchange of symbols can dismantle the barrier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and cultural bearings, reshaping the identification readily agreed amongst interlocutors upon the moment of discourse. Meanwhile, it paves the road for a further communication of positive responses.

Keywords: aesthetic moment, consubstantiality, dialogic, division, Identification